

俄羅斯半總統制下普金歸位與 民主發展之探討*

許菁芸
南華大學

摘要

在憲法的半總統制的框架下，俄羅斯高度人治的現象也讓西方學者認為是政治威權的再現，嚴重影響俄羅斯的民主進程。俄羅斯於2011年12月4日舉行國會大選，5日公布大選結果，執政的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在大選中勉強獲得近5成的選票，但是，如從2011年的俄羅斯國會大選結果分析，民眾對於俄羅斯政府（或普金的執政）的執政確實帶著不滿情緒，但卻也不是對政權合法性的質疑，因此，2012年總統大選，普金成功歸位。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在於解析俄羅斯半總統制下普金歸位對俄羅斯民主之影響與展望。研究發現俄羅斯即使實施中央再集權政策，卻仍以民主為名（主權民主），而其非制度性策略的實施，也是以制度性策略作為包裝，而制度性因素，包含國會與政黨、公民社會與反對團體的立法規範（無真正之反對力量），再加上俄羅斯人對於民主的特殊看法與期望，使得普金成功三任總統職位，但是，在未來的六年任期間，面對抗議與支持率的降低，如何超越自己前面的政績，將俄羅斯帶往人民所期望之「民主」與強大國家願景，將是普金三任總統後必須直接面對的課題。

關鍵詞：俄羅斯、普金、總統大選、國會、合法性

許菁芸 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專案助理研究員和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俄羅斯政府與政治、民主與民主化、中俄關係等。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12年3月17日由台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主辦之「第三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作者非常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提供本文修繕與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收件：2013/3/8，修正：2013/7/22，接受：2013/11/22）

壹、前言

2011年12月5日俄羅斯國會國家杜馬（State Duma,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Дума）大選結果（見表一）公布後，7日普金（V. V. Putin, В. В. Путин）正式登記參加今年3月俄羅斯總統大選，旋即在莫斯科和聖彼得堡等地，引發大規模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金的遊行示威，反對黨及觀察員指控這次大選有做票及舞弊嫌疑，並透過臉書（Facebook）和推特（Twitter）串聯，同時號召民眾上街抗議，反對普金長達12年的執政，2012年1月1日再度出現的反普浪潮，再加上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 party, Единая Россия）未過半的得票率，使得全球媒體紛紛猜測原本似乎毫無疑問的俄羅斯總統大選增添了幾分變數，雖然，選舉未見有任何強力對手足與抗衡，各界咸認普金將可穩操勝券。

2012年3月4日，俄羅斯如期舉行了總統大選，當日晚9時結束。5日公布選舉結果，根據俄中央選舉委員會的統計，俄羅斯總統候選人普金得票率為63.6%，獲得約4,559萬張選票。俄共領袖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 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居次，為17.18%，獲得1,231萬張選票；獨立候選

表一 第六屆（2011）國會杜馬參選政黨、票數席位數與得票率（7%門檻）

政黨	票數	席位數（得票率）
統一俄羅斯黨	32,379,135	238（49.32%）
俄羅斯共產黨	12,599,507	92（19.19%）
正義俄羅斯黨	8,695,522	64（13.24%）
自由民主黨	7,664,570	56（11.67%）
俄羅斯民主聯盟「雅布羅柯」黨	2,252,403	0（3.43%）
俄羅斯愛國者黨	639,119	0（0.97%）
右派事務黨	392,806	0（0.60%）

資料來源：ЦИК России（2011）。

人普羅霍羅夫（Mikhail D. Prokhorov, Михаил Д. Прохоров）為7.98%，得到571萬張選票；自由民主黨領袖季里諾夫斯基（V. V. Zhirinovski, В. В. Жириновский）得票率為6.22%；正義俄羅斯黨領袖米羅諾夫（Sergey M. Mironov, Сергей М. Миронов）得票率為3.86%（見表二）。

表二 俄羅斯2012年總統大選結果

	所獲得選票數	總得票比率
普金（統一俄羅斯黨）	45,591,642	63.60%
久加諾夫（俄羅斯共產黨）	12,316,976	17.18%
普羅霍羅夫（無黨籍）	5,718,433	7.98%
季里諾夫斯基（自由民主黨）	4,457,785	6.22%
米羅諾夫（正義俄羅斯黨）	2,763,463	3.86%

資料來源：ЦИК России（2012）。

普金在第一輪投票得票率超過60%，宣布正式當選，但分析2011年國會選舉結果與2012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果，提出下列三點問題：

- 一、普金此次的總統大選得票率雖為63.6%，與前一次2004年的71.3%相比，遜色許多，且幾次爆發的反普抗議運動，也讓普金在此次的總統大選個人形象褪色，普金向來的個人領導魅力（charisma）與支持度也在此次國會大選後，曾經一度下滑至50%以下。可以看見，對於克里姆林宮所在之行政中心的莫斯科，人民對於普金的再執政已由選票表現不滿。普金與梅德維傑夫的職位互換被視為統治菁英利益交換，是否已讓民眾無法接受？抑或是普金十二年（包含總統八年和總理四年）執政所形成的國家體制分裂所產生的副作用—恩庇侍從（patron-client）、酬庸、尋租等已讓俄羅斯民眾與反對團體大感不滿，而造成整個統治結構的合法性下跌危機？

- 二、在2011年的國會選舉中，普金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獲得的得票率並未

過半，但從總統大選結果公布後，統一俄羅斯黨的得票率與普金的得票率並不對等，兩者之間有著將近15%的差距，由此可見，政黨與國會仍舊在俄羅斯人民的心目中扮演著極不信任的角色。^① 普金在其執政期間，修改「政黨法」(on political parties)與「國會杜馬議員選舉法」(on the election of deputies of the state Duma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② 更在國會的議會監督職責部分做了大規模的調整，普金是否是以表面民主法治，來行集權之實？而此慣常的行政模式是否嚴重影響俄羅斯的半總統制與民主進程？

三、從2011年的國會大選結果，可以發現民主自由主義取向的政黨，俄羅斯民主聯盟「雅布羅柯」黨(3.43%)和右派事務黨(0.60%)在此次的選舉中仍然沒有分配到席位，而2012年的總統大選中也未見民主黨派的候選人，此是否顯示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的渴望度和期望值不高？亦或是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的詮釋有異於西方的價值觀？

綜觀普金與梅德維捷夫的職位互換和當下政憲政體制和政治局勢之間的關係，政局不安之間有著很大的關連。俄羅斯並沒有府會分立、沒有總統和總理不同黨的問題，所以是高度的一致政府，總統和總理也沒有失和（少數可能例外如Kudrin去職事件），甚至總統和總理還將要相互交換職位，當然歸位的本身也是半總統制底下才能夠出現的情況，俄羅斯半總統制如何使得歸位可能，甚至對菁英而言成爲必要。2008年普金從總統轉任總理，非制度性因素（菁英）成爲普金地位轉移卻依然權力鞏固最大的成功關鍵（許菁芸、宋鎮照，

^① 列瓦達分析中心在2007年5月3日公佈之跨2001年、2006年及2007年的人民心目中「值得信任的國家機制」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2001年、2006年及2007年俄羅斯總統都最爲人民所信任，而俄羅斯議會，包括國家杜馬與聯邦院都敬陪末座（倒數二、三名），其中對政黨的信任程度爲最低，僅有7%（許菁芸，2010:142-43;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07）。

^② 有關「政黨法」與「國會杜馬議員選舉法」對國會與政黨的影響，請參考許菁芸（2010:144-45），但是，作者觀察多年俄羅斯國會與政黨的運作後，對於普金修訂「政黨法」與「國會杜馬議員選舉法」之用意，雖然表面上改革國會過去多黨亂象，卻也造成權力黨「統一俄羅斯黨」獨大，凌駕於其他黨派，因此，此也是以表面民主法治來增加政權合法性，實則行集權之實來增強威權體制的運作。

2012:117-75)，而2012年的總統大選雖然引發反普抗議，普金仍然成功歸位，此時半總統制下的制度性因素—國會與政黨的合法性功能又再度扮演了促使歸位成功的推手。故，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 一、從半總統制的運作與次類型分析俄羅斯2008-2012年俄羅斯半總統制運作下高度人治之特性（包含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並由此解析2012年民眾對於普金歸位之抗議與普金歸位之成功因素。
- 二、再者，從普金政權（2000-2008）之中央再集權政策之實施策略做一綜合性探討，可以發現俄羅斯即使實施中央再集權政策，卻仍以民主為名（主權民主），而其非制度性策略的實施，也是以制度性策略作為包裝。
- 三、因應此邏輯，而歸納出俄羅斯目前政治系統徘徊在制度與非制度、正式與非正式間、法理與新世襲氛圍間之矛盾，並由此將焦點放置在普金一直積極經營之半總統制下之制度性因素—國會與政黨之控制與增強政權合法性功能，並佐以俄羅斯人特殊的民主觀點，藉此來歸結俄羅斯人民對民主的看法和期望表達出對於普金與統治菁英之非制度性的副產品—恩庇侍從、酬庸、尋租等官場作為形成難以根斷的貪污與腐化，及統治菁英封地自限，缺乏由下至上的垂流流動途徑，或稱菁英從社會到國家的流動（the circulation of elites from society to the state），已讓俄羅斯民眾與反對團體大感不滿，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
- 四、即使民眾大規模抗議，普金歸位成功，並非偶然。制度性因素，包含國會與政黨、公民社會與反對團體的立法規範（無真正之反對力量），再加上俄羅斯人對於民主的特殊看法與期望，使得普金成功三任總統職位。
- 五、探討普金歸位後，俄羅斯的政治系統在制度與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法理與世襲制氛圍間的可能性調整，並分析藉由普金如何以調控制度性因素來促使俄羅斯的政治穩定。

貳、俄羅斯半總統制實質運作與普金政權之政治系統矛盾 詮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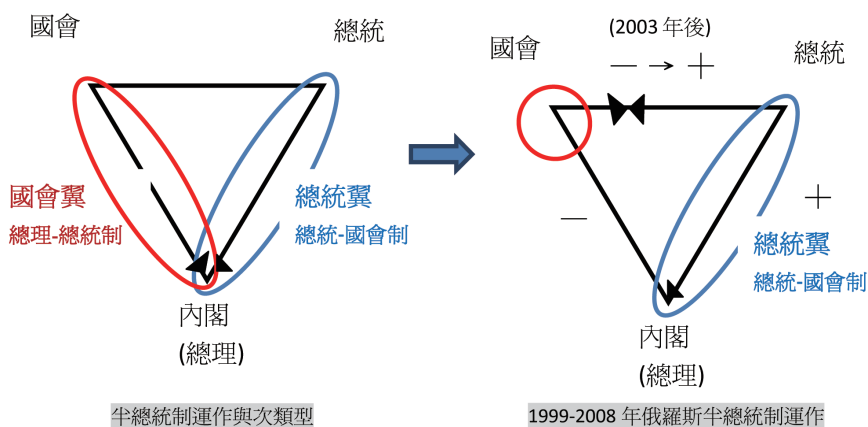
一、俄羅斯半總統制實質運作

「半總統制」(semi-presidentialism)是有別於總統制與內閣制的第三種憲政體制類型。這種憲政體制同時兼具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制度精神，且總統與閣揆皆享有行政權。由於總統和國會爭奪對於政府(內閣)的控制是半總統制的結構性缺陷(吳玉山, 2002:232)，現今半總統制研究中最常採用的是Shugart-Carey兩分法，將半總統制區分為國會多數決定總理與內閣人事之國會翼「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ism)和總統決定總理與內閣人事之總統翼「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ism)。(圖一左圖)

俄羅斯聯邦的憲政體制是基本上是半總統制，很多學者對於這點都有共識(Linz, 1994; Troxel, 2003; Elgie, 2007; 吳玉山, 2002)。但對於俄羅斯是屬於半總統制下的何種次類型，則存在著很多意見紛歧。對於俄羅斯在半總統制下的次類型看法，在2008年普金卸任以前，超級總統制(super-presidentialism)或總統—議會制(president-parliamentarism)皆是學界普遍的看法。(見圖一右圖)

而2008年以後，梅德維傑夫(D. A. Medvedev, Д. А. Медвѣдев)當選總統，普金轉任總理兼統一俄羅斯黨黨主席，如依舒加特和卡瑞(Shugart and Carey, 1992)認為的杜瓦傑(Duverger, 1980:165-87)半總統制為「總理—總統制」定義，^③俄羅斯似乎自2008年起開始啟動「總理—總統制」(premier-presidentialism)的腳步，但從普金擔任總理兼任國會最大黨「統一俄羅斯黨」

^③ 根據杜瓦傑(M. Duverger)的論點，半總統制具有三個特徵：其一，總統由普選產生；其二，總統擁有實質重要權力(considerable powers)；其三，存在獨立的內閣掌握行政權，並對國會負責。



圖一 半總統制運作與次類型與1999-2008年俄羅斯半總統制運作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黨魁，再從普金在總理位置上的強勢主導行政態勢，和梅德維傑夫居於臣屬與反抗矛盾情結中看來，俄羅斯的政治體制呈現了高度人治的現象，也就是普金佔據哪一個位置，俄羅斯就是哪一種體制。「梅普共治」中普金的強勢總理角色，無論在形象上或權力上似乎都超越了總統梅德維傑夫，俄羅斯憲法設計、長久積弱的政黨與國會之制度性因素實質上是無法真正成為總統與總理權力競逐的工具，而是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普金所領導之統治菁英派系與權力傾軋，鞏固權力層級的蘇聯遺緒，掌握有效的垂直權力鏈（restore an effective vertical chain of authority）體系（Ross, 2005:355），^④ 才能在未修憲的情況下，讓總理之權高於總統並掌握國會。（見圖二左圖）

^④ 而所謂的垂直權力鏈體系現象，普金從建立自身的權力菁英開始，以迅速崛起的經濟成長及國家政策的漸次調整為輔，逐步建立自身的權力層級（power hierarchy）—普金與權力菁英建構了普金政權，資源型經濟驅使中央集權的動力，普金政權控制國會與政黨，政黨再控制地方議會及首長，而地方議會和首長再來控制聯邦主體，出現層層權力鍊的控制（許菁芸、宋鎮照，2012:117-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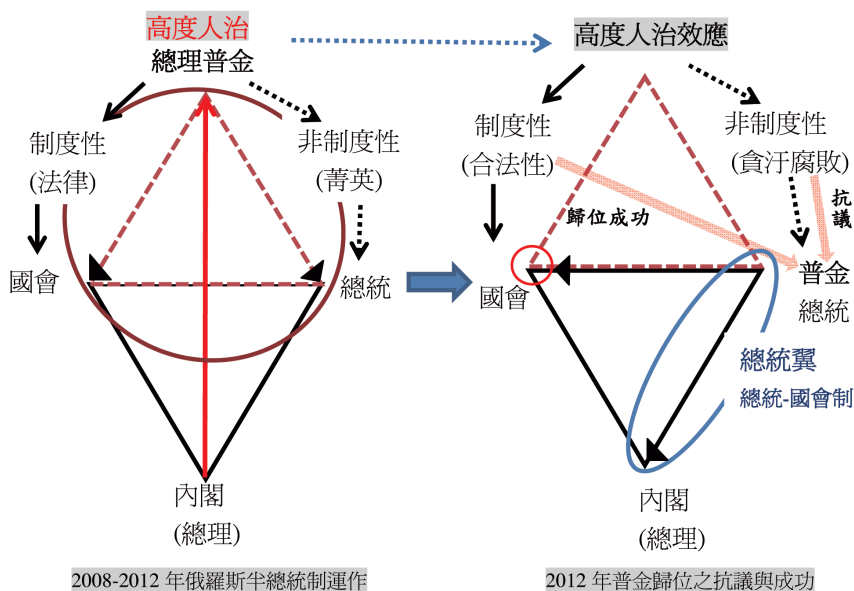
而從2008年起之「梅普共治」時期，位於俄羅斯憲法體制下之較總統弱勢之總理職位的普金，爲了能以制度性設計之國會與政黨和非制度性設計之權力菁英層級來鞏固權力，在制度性策略方面，除了延續其中央再集權政策之弱化國會與政黨制度，更持續性地加強媒體的管控與壓制反對勢力的崛起。而在非制度性策略方面，普金對於自身與權力菁英層級的維持更加不餘遺力，其採取的方式則不外乎以恩庇侍從、酬庸、尋租等檯面下作爲，而更讓俄羅斯的貪污腐敗政治文化深植，即使總統梅德維傑夫幾次厲聲打擊貪污，仍不見成效，導致相當多的民眾反感（尤其是網民），而在2011年底的國會大選中，以選票與抗議聲浪反對梅普交換職位和普金的再執政。但此股聲浪仍不敵普金與權力菁英們對於憲法與制度的操控，在缺乏強烈反對力量與一般民眾對於安定秩序生活的期待下，普金仍於2012年總統大選中順利當選總統，再次歸位，讓俄羅斯的體制又顯現了總統一國會制的樣貌，但卻也不如以往兩任總統時，此次普金要面臨的民眾不滿聲浪也會不同以往。（見圖二右圖）

二、普金政權之中央再集權政策與政治系統矛盾詮釋

俄羅斯的半總統制實際運作之高度人治現象，實際上普金政權爲了鞏固權力而實施之中央再集權政策的具體呈現，但爲了使中央再集權政策在表面上不損及政權的合法性，普金堅持憲法法制，從制度性的表面民主措施來增加個人與政府的威信，卻以非制度性策略，以權力菁英層級間的權力傾軋來鞏固自身權力，來使得歸位成爲必然。

（一）普金政權之中央再集權政策施行策略

普金在2000至2008年擔任總統期間，他的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strong state），也就是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試圖恢復有效的垂直權力鏈（restore an effective vertical chain of authority）體系，其實施的中央再集權（recentralization）政策，使得俄羅斯的民主化走向隨著普金的個人威權的鞏固招致了許多批評。



圖二 2008-2012年、2012年後俄羅斯半總統制運作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普金的中央再集權政策的啟動有以下策略：其一、意識形態策略，也就是「普金主義」與「主權民主」的向下紮根；其二、為經濟策略，逐步將石油和天然氣上中下游產業收歸國營，次將石油、天然氣與重要地下礦產等急速帶動俄羅斯經濟成長的能源與資源鎖定控制為「戰略」(strategic)部門，特別是原物料部門的石油；其三、為制度性策略，修改「政黨法」(on political parties)與「國會杜馬議員選舉法」(on the election of deputies of the state Duma of the federal assembl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來實施單一政黨策略與掌握國會，並於2008年11月21日國家杜馬通過了將總統和國家杜馬議員任期由四年分別延長至六年和五年的憲法修正案，更為普金的執政之路鋪上了延長權力基礎的紅毯；其四為非制度性策略，藉由鞏固權力菁英網絡，來穩固個人威權。

1. 普金主義與主權民主

McFaul (2005:5) 認為，在1989到1992年之間發生在共產集團國家的民主化浪潮產生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結果，吳玉山據此將之區分為「穩定民主群」(stable nascent democracies)、^⑤「總統專制群」(presidential autocracies)，^⑥與介於兩者之間的「競爭性的威權體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俄羅斯就是屬於「競爭性的威權體制」的代表國家(吳玉山，2007:71)，也就是一種雖然具有競爭性選舉，但是政權還是牢牢掌握在威權統治者手中的制度。

許多分析論及俄羅斯現任總理普金如何能在總統任期內得到俄國人的高度擁護，主要歸因於他對國家經濟復甦的貢獻。1998年他出掌聯邦安全局，正值俄國面臨嚴重經濟危機：通貨膨脹不可收拾，盧布貶值達60%，外國投資望而卻步。1999年8月，他被任為總理，年底葉爾欽辭職，他順理成章代理總統職務，任內將幾個棘手的改革項目包括國會、政黨、經濟、與地方等各方面的改革，推動前進，經歷連續10年的平均有7%的經濟成長率，建立他有行政魄力的形象。因此西方分析家將普金介於中央集權的威權統治和民粹主義間的統治風格冠以普金主義(Putinism, Путинизм)。其治理的特徵在經濟金融上加強中央政府對企業領導人的指揮；在政治上除了加強對國會與政黨的掌握外，亦強化中央對地方控制權，並加強對NGO組織以及媒體的管理；在經濟上加強對戰略部門的調控外，也以福利與薪資的穩定與增長增加人民的支持度；在對外關係上則採取與前任的葉爾欽不同，前期採經濟至上的歐亞實用主義，後其採西方懷疑論傾向(康世昊，2009:7)。

因此，普金主義是俄羅斯普金總統任期至2008年卸任後轉任總理掌握實權

^⑤ 如波蘭、捷克(後來再加上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等中東歐國家，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等前蘇聯共和國出現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權，進行了多次的政黨輪替，民主鞏固有了穩定的進展。

^⑥ 如中亞國家，除了吉爾吉斯之外，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塔吉克基本上都是由蘇聯時期就掌權的各國共黨第一書記持續主政，只不過其身份變成了總統，而且大部分還透過公民投票或修改憲法，使自己成為實質上或法律上的終身總統。

的治理方式總稱，涵蓋了俄羅斯各層面的機制，尤其強調俄羅斯政治力之控制手段，其最主要的呈現，就是俄羅斯的中央再集權化。因此，西方輿論與媒體稱呼「普金主義」時都帶著負面的思考與形象，^⑦ 認為「中央集權」為俄羅斯自始至終的主要目標，民主只是假象，費雪（Fish, 2005）斷言俄羅斯的民主失敗，原因在於原物料資源豐富、經濟自由化不足和超級總統制之憲政結果。

普金執政之後，一向強調俄羅斯已經是民主國家，從不籠統地否定民主，以免給西方提供俄羅斯「民主倒退」的藉口，2006年6月28日，俄總統副幕僚長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 Владислав Юрьевич Сурков）在會見外國記者時提出了「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政治概念（Сурков, 2006），提出俄羅斯的民主發展方向雖與西方預期不同，卻也是根據俄羅斯歷史、文化、國情和地緣政治所調整出來的民主模式，與傳統的民主精神並無悖離。^⑧ 俄輿論「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指出，主權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它「準確地指出了，普金政權的政治內涵」及其「政治體制的特點」（Известия, 2006）。普金從執政理念把民主定位於「主權民主」，並以此來反擊西方的抨擊與控制策略，是其執政理念與實踐的發展與創新。

普金在2007年國情咨文中明確指出政治價值觀確立與鞏固的非常重要性。在普金看來，主權和民主都重要，但相比之下，主權又比民主更重要。「主權是當今最寶貴的東西，可以說是無可替代的。沒有主權，俄羅斯無法生存。在俄羅斯，民主只有在擁有主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鞏固，同樣也只有在擁有主權的情況下才談得上國家的發展與民族的復興」（Путин, 2007）。「主權民主」的核心就是強調俄羅斯式的民主模式，它既是一種意識形態，也是一種政治制度，在這種制度下，民主程序和準則必須服從於愛國主義和強權國家體制的

^⑦ 如Beichman, 2007; Will, 2004; Shelton, 2008。

^⑧ 吳玉山認為「主權民主」是俄羅斯希望能夠擺脫西方的壓力，以俄羅斯本身的國情，來搭建出適合本身的民主體制，也可以說是民主制度和民族主義的揉合，或是「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吳玉山，2009:204）。

建造。簡言之，「主權民主」概念的核心就是權威主義，即在政治強人的領導下，依據法律法規強化中央權威，強化國家主權，此種思考模式即是「普金主義」的精髓。而梅德維傑夫時期，俄羅斯政治發展的主要特徵是延續性，而延續性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延續普金的政治理念。

2. 資源型經濟的鞏固與發展

1991年蘇聯解體後，獨立後的俄羅斯正是從整個制度崩潰的廢墟中開啓了邁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途徑。從1991年12月獨立到2008年5月普金總統卸任，乃至於2008年底襲捲全球的金融風暴前，在這20年間，俄羅斯經濟發展主要經歷兩個階段—葉爾欽執政時期（1991-1998）和普金執政時期（1999-迄今），值得注意的是，此兩個階段之變化，政治上除了領導人之更替外，經濟上之表現更是截然不同。除了在第一階段葉爾欽執政時期至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俄羅斯人民經歷了經濟大幅度衰退、通貨膨脹和失業率大幅上升之痛苦外，1998年金融危機後，國際油價逐步攀升，俄羅斯的經濟快速起飛，從2003年以來，石油天然氣資源的出口一直佔俄羅斯國內生產總額的20%以上、國家總收入的30%以上（僅稅收就佔24%），聯邦預算收入的一半以上和國家外匯收入的近55%，工業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2008）。俄羅斯依靠石油出口獲得了可觀的額外收入，不僅使俄羅斯政府提前償還了IMF的全部債務，還如期償還了巨額外債，補發了拖欠的工資，增加了固定資本投資，提高了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收入，可以說，石油收入增加是俄羅斯近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

2006年OECD將俄羅斯經濟發展模式定義為資源型經濟（resource based economy），根據OECD的定義，資源型經濟係指自然資源產出佔GDP的10%以上，佔出口40%以上的經濟。當原物料價格經常波動，進口收入相當倚賴國際價格時，也正隱含著資源型經濟國家對於外在環境的衝擊是相當脆弱的（Ahrend, 2006）。

也由於體認到經濟體制的脆弱性，俄羅斯積極控制國家能源與資

源。從2003年之「202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 2020;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到2009年「203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 2030;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與2008年通過之「外國戰略投資法」（the foreign strategic investment law或簡稱“FSIL”, Закон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ях或簡稱“ЗСИИ”）等相關政策與法條來看，^⑨ 俄羅斯對於石油和天然氣能源視為國家的經濟命脈，對於國外的投資與國內的政策都不肯鬆綁，例如「2030年前的能源戰略」與「2020年前能源戰略」，雖然在主要的生產數據與主要指數都有做修改，但基本性質仍是不變，仍是將油氣資源及地下礦產視為戰略部門，雖有在此次的戰略中提及放寬管制，但仍堅持國家主導相關能源決策，由此可見，莫斯科當局將能源視為國家安全資產，而非以市場產品看待（Sevastyanov, 2008:53）。

此外，如果從1999年至2010年的俄羅斯GDP主要總體經濟指標和油價來看，俄羅斯經濟波動與國際油價上漲有著明顯的關聯性。而世界銀行於2011年9月發布的俄羅斯「No.26 經濟報導」也指出俄羅斯在2009年-7.8%的GDP成長率與2010年GDP恢復為4.0%的成長率的主因皆是因為國際油價漲跌（World Bank, 2011:1-6）。因此，國際能源價格的高漲，不僅有助於俄羅斯經濟成長，同時在徹底有效地掌握油氣能源，也成為中央再集權的重要動力與誘因。^⑩

^⑨ 有關「202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203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和「外國戰略投資法」相關分析請參考許菁芸（2012）。

^⑩ 吳春光（2008）發表於政治科學論叢的「普京的能源政策分析」一文，以原油和天然氣的價格及產量對每人平均國內生產毛額進行格蘭杰因果關係檢定（granger causality tests），再以衝擊反應函數（impulse respond function）來評估俄羅斯原油和天然氣政策的執行績效，而發現國際原油價格的上漲對俄羅斯經濟成長的預測具有顯著的格蘭杰因果關係和正向的衝擊反應（吳春光，2008）。當然，2005年的俄羅斯全國性的大規模抗議和2008年喬治亞戰爭、全球金融風暴是俄羅斯GDP成長率下跌的因素之一，但如果就長期性的觀察而言，油價上漲與俄羅斯的GDP成長是有顯著的關聯性。

表三 俄羅斯主要總體經濟指標和世界油價（1999-2010年）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GDP成長率, %	6.4	10.0	2.1	4.7	7.3	7.2	6.4	7.7	8.1	5.6	-7.8	4.0
工業生產成長 率, %	11.0	11.9	4.9	3.7	7.0	7.3	4.0	3.9	6.3	0.6	-9.3	8.2
固定資本投資 成長率, %	5.0	17.4	10.0	2.6	12.5	10.9	10.7	13.7	21.1	9.8	-16.2	6.0
通貨膨脹率 (CPI), %	36.5	20.2	18.6	15.1	12.0	11.7	10.9	9.0	11.9	13.3	8.8	8.8
油價, Urals (USD/桶)	18.3	26.6	22.9	23.7	27.0	34.4	50.7	61.2	69.5	95.1	61.76	76.8
外匯存底(包 含黃金)單 位: 億/美金	125	280	366	478	769	1245	1822	3037	4788	4271	4390	4794

資料來源：茲參考下列資料之統計數據綜合整理而成（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2008:30-31, 251; World Bank, 2011:26）。

3. 制度性策略：「強總統一弱國會」與「權力黨」獨大

從1993年12月第一屆國家杜馬選舉開始，左派的力量，即俄共與自由民主黨等就在國會一直領先，1995年第二屆乃至1999年第三屆選舉，俄共成爲杜馬第一大黨團（1995年佔有157席，1999年佔有103席），雖然國會與總統的交鋒，幾次國會皆居於弱勢，但是在制衡總統權力上，仍有發揮一定的效用。鑒於如此，總統普金積極促成「團結」黨、「祖國」運動和「全俄羅斯」運動聯合並建立新黨，2001年12月1日「團結」黨、「祖國」運動和「全俄羅斯」運動三大政治組織舉行合併大會，成立「全俄羅斯團結—祖國」黨，簡稱「統一俄羅斯」黨，之後該黨聯合「人民議員」和「俄羅斯地區」等議員聯盟，擁有杜馬二百四十多個席位，形成了支持總統的多數黨，成爲自葉爾欽時期以來，

第一個擁有國會多數的「權力黨」，^①而該黨也因為普金的強烈加持，在2003年的第四屆國會大選中，以37.57%的支持率成為杜馬第一大黨，遠勝於俄共的12.7%。

再者，2001年通過的新「政黨法」規定了政黨必須遵守的基本原則以及一系列限制性和禁止性條款，只允許建立全俄羅斯聯邦範圍的政黨，不承認地區性政黨，政黨至少擁有一萬名黨員（但在2004年的修正案中，提高至五萬名），如果一個政黨在五年內沒有提出自己的候選人或候選人名單參加選舉，將取消其註冊資格，黨員在當選為總統後，應該即刻終止自己的黨員資格。

2005年5月19日總統普金簽署新的「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其真正目的在於降低國會政黨的數目，增加政黨對於黨員的控制力，也為其未來權力生涯鋪路（此點明顯可於第五屆國家杜馬選舉前後看出），於是將混合式選制改為比例代表制，所有議員代表依比例代表制選出，法案還禁止選舉同盟，只有政黨成員可以成為候選人，非政黨成員或其他政黨的人員必須列入某一政黨的候選人名單，才可以成為候選人，但是其數量不得超過名單總數的50%，得票率超過7%的政黨才有權分配國會席位。^②而此法案的通過，已經明顯地影響了政黨體制的走向與2007年國家杜馬的議員聯盟。

2007年12月2日舉行了第五屆的國家杜馬選舉，由於「統一俄羅斯」黨於10月2日宣佈普金為該黨候選人名單首位，並以普金為號召，大幅拉抬了該黨的聲勢，於是普金所領導之「統一俄羅斯」黨以超過半數64.30%的超高支持率再次成為杜馬的第一大黨。由於此次採用新選舉法，依比例代表制的選舉結果

^① 俄羅斯本來就不存在實質之執政黨，而只有總統支持之「權力黨」，這是俄羅斯國會的主要特點。「權力黨」是蘇聯解體後在俄羅斯出現的特有現象，它不是執政黨，而是受制於總統，是執政者的支撐力量，實施執政者的政治意圖，確保權力的穩定，通過其在議會中的議員代表使執政者的決策合法化，與此同時，「權力黨」也能從執政當局得到有利的資源，確保本身的地位，故「權力黨」與權力當局的關係是互惠的（Коргунюк, 2001:19）。

^② 得票率達到7%的政黨不能少於兩個，它們的得票數總計不得少於選民的60%，假如得票率達到7%的政黨少於兩個，未達到7%得票率的政黨也有可能依次進入杜馬。

大幅縮減了進入國會的政黨數目，11個政黨參選，共計只有四個跨越7%的政黨門檻得以進入國家杜馬分配議席，這四個政黨中，只有共產黨可以算是反對黨，普金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和另外一個親克里姆林宮的政黨「正義俄羅斯」黨，得票率加起來超過7成，在450席的下議院中，攻佔353席，此結果普遍認為是普金即將卸任前之重要權力佈局，不僅關係到普金政治生涯之延續，更是未來國會之權力黨轉換為執政黨的重要契機。

2008年11月21日國家杜馬以392票贊同、57票反對的結果，三讀高票通過了將總統和國家杜馬議員任期由四年分別延長至六年和五年的憲法修正案，修正案具體的修訂條款為《俄羅斯聯邦憲法》第81條和第96條，與此同時，梅德維傑夫國情咨文發表之後的當天，有克里姆林宮高級官員表示，總統和國家杜馬任期的延長不適用於現任總統和議會。換言之，這些新舉措將適用於下一個選舉期，即2011年舉行的國家杜馬選舉和2012年舉行的總統大選產生的新一屆國家杜馬和總統。這也意味著，普金2012年再次當選總統，有可能會至2024年（兩任12年）才卸任，俄羅斯的半總統制已經趨於強勢總統，未來是否會走向如中亞國家般的「總統專權」，這也考驗著俄羅斯的民主未來（許菁芸，2010:128-45）。

4. 非制度性安排：鞏固統治菁英

布里辛斯基（Brzezinski, 2008:95-116）概括俄羅斯的民主現況是普金的抉擇，更精確來說，他和俄羅斯學者伊諾忍徹夫（Vladislav Inozemtsev, Владислав Иноземцев）的認定相同，俄羅斯現今的體制得「歸功」於普金政權（Putin regime），但是，普金政權是普金與其背後的統治菁英所架構，此體制是更反映出普金與其統治菁英的特質、背景與思維模式，其主要目的就是鞏固自身的權力。支撐普金統治菁英權力層級的基本思想，國家（state）是一個霍布斯式的巨靈，對人民不用負擔責任而只追求自身的利益。本質上來說，俄羅斯統治菁英的「國家」（state）一詞意謂著統治階級，以及這個統治階級

為確保自身優勢地位所創造出的機制的代名詞（Inozemtsev, 2009:40-60）。

如同普金於聖彼得堡出身的背景與生涯經歷，八年的總統生涯，普金逐漸構建起圍繞自身的統治菁英三大權力體系：強力集團（siloviki, силовики）、聖彼得堡幫（Petersburgers, петербуржцы），及溫和改革派（moderate reformist）。透過強力集團，普金控制了俄羅斯的憲政體系的「武力部門」（power bloc）；透過聖彼得堡幫，普金控制了克里姆林宮；而透過溫和改革派，普金得以推進其經濟改革。可以說，憑藉並操控這三大權力菁英體系，並利用彼此間的權力傾軋，普金清除了政治強敵，鞏固了政治地位，形成了非常牢固的政治權力架構，也為了維持此權力架構，中央集權的政治威權統治成了普金的政治方向選擇。

檢驗俄羅斯的民主發展，對俄羅斯的統治菁英而言，民主只不過是一種政體的形式，是一種達到更進一步目的的手段。民主本身並不是終極目的，因此也可以為了終極的目的（例如民富國強）而加以修正（吳玉山，2009:203-04），而對於俄羅斯人民而言，由於自1991年蘇聯解體後，政治經濟的動盪導致人民極度渴望安定、渴望秩序，甚至認為秩序可凌駕於民主價值，¹³ 因此，人民的渴望成了統治菁英操縱民主的工具，而統治菁英為了自身權力的鞏固，除了更加擁戴普金之外，還更進一步地以控制菁英徵聘系統與操控資源型經濟來增進中央集權。

（二）普金政權之政治系統矛盾詮釋

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發現，普金的國家領導風格是極其矛盾，一方面堅守法理，採行制度性的策略，但為了鞏固權力，又積極運行非制度性策略，

¹³ 在「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 (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1年1月18日公布有關「秩序或民主？」（Order or democracy?,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民調中有56%的人民認為要達成秩序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11）。

但有一點是不變的，就是國家主權主義——一個強大的俄羅斯國家。而Sakwa（2008:884-86）也指出普金的國家改造模式也在兩種型態間徘徊，一是回歸憲政（reconstitution），另一是回歸集權（reconcentration）（見表四）。普金曾於2000年就任總統時，承諾要維護現行的憲法原則，並確保憲法之普遍適用和憲法至高無上，也許可以將其欲改造之國家型態稱之為「回歸憲政」，但就位之初，葉爾欽政權所遺留的餘毒——疲弱的經濟、寡頭、分離主義等，致使普金運用鐵腕，以法治為名，行極權之實。

而Whitmore（2010:999-1025）更直言普金政權的非制度性運作模式為「新世襲制」（neopatrimonialism），新世襲制早先是非洲研究學者根據韋伯（Max Weber）的世襲制理論的基礎上所制定的。非洲的新世襲制度常被認為是政府與官員職能不清的結果，而這樣的制度卻在形式上依然保持了現代體制與政府程序。^④ 而新世襲制國家最核心的特徵是個人化的權力。正式的規則相較於領導權力的非正式網路來說，是比較不重要的。Lynch（2005:152-63）更認為俄羅斯從建國之初，也就葉爾欽執政時期乃至普金執政時期都是採行新世襲

表四 普金的國家改造形態矛盾

國家型態（state type）	結果（outcome）	實踐（practices）
回歸憲政 （reconstitution）	多元國家主權主義 （pluralistic statism）	法之普遍適用、立憲主義、享有平等的公民、有效聯邦制、自主的公民社會
回歸集權 （reconcentration）	壓縮國家主權主義 （compact statism）	中央集權化、濫用法律、管理式民主

資料來源：Sakwa（2008: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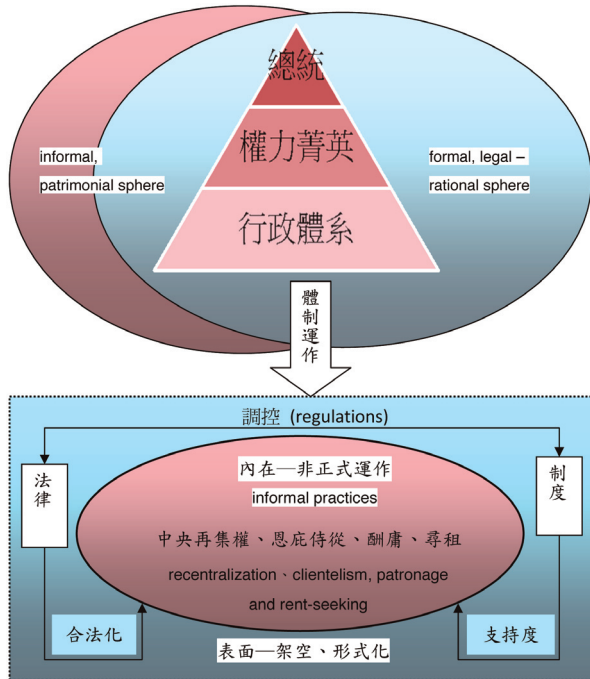
^④ 世襲制之所以加上「新」這一前綴，是為了解明新世襲制度與歷史中的世襲制度有所不同。與世襲制度不同（韋伯將其理解為某種權力傳統），新世襲制度不基於非人際互動，而是將司法官僚規範及結構與權力關係或人際關係結合起來，世襲制度與司法官僚因素的並存，引發出一個重要問題，即權力互動的形式與結果。事實上，新世襲制度導致「雙重形勢，即一個國家既實行世襲制，又十分官僚化」。

制，真正的權力都是圍繞在總統和其統治菁英上，從國家政權建立恩庇侍從的關係壟斷性之國家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上，透過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來分配政經利益給其追隨者或結盟者，以獲取後者的政治效忠或支持，從而非正式地增強統治權力核心所遂行之威權統治之合法性。

但是，俄羅斯國家的合法性是正式根植於1993年俄羅斯聯邦憲法第一條「俄羅斯聯邦—俄羅斯是具有共和制政體的、民主的、聯邦制的法治國家」的民主根基中—公民選舉制度、民選或被人民肯定的總統、議會和憲法。而對於合法性法理的要求也同時降低了統治成本。因此，法理氛圍的維持對於政權合法性而言，是極其重要的。合法化被視為國家立法的關鍵性功能，特別是在該機構在政策影響或利益銜接方面起著最低或邊際作用的國家。¹⁵

由此可見，普金政權運作擺盪在法理（legal-rational）與世襲制（patrimonial）的氛圍（sphere）裡（見圖三），也就是正式與非正式之間，是極及矛盾的。普金曾於2000年就任總統時，公開發言要成為憲法和法律的捍衛先鋒，但諷刺的是，他及其領導團隊以法律與制度來增加政府的合法性與支持度的同時，卻以非正式運作，如恩庇侍從、酬庸和尋租等來鞏固自身權力與架空法律與制度的內涵，無論是政治面或是經濟面，引起貪腐不斷，卻根絕不了。而國會與政黨的作用，從政黨法對於登記政黨的諸多限制與繁複程序限制了政黨的自由發展，制國會監督權力的諸多調控，如政府時間（the government hour,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час”）、公聽會（hearings, “слушания”）、反腐敗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комиссия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¹⁵ Packenham (1970:81-96) 提出三種伴隨國家立法的合法化過程—潛伏、顯明和「安全閥」（latent, manifest and ‘safety-valve’）。潛伏合法化（latent legitimation）為公開且定期的立法會議，象徵民意對政權的認可。顯明合法化（manifest legitimation）意謂著以公民的名義批准行政決定與政策，也被視為對國內與國際的合法性是極其重要的，包含提供政府一個對選民解釋政策的平台之政治系統維持功能。「安全閥」合法化（‘safety-valve’ legitimation）表示立法機關提供一個論壇的能力，此論壇允許政策的對手和反對派政治家公開表達他們的意見，藉此宣洩系統的緊張局勢，但無論如何也不會影響最後的政策選擇。



圖三 普金政權運作與執政矛盾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коррупции”)和議會調查 (parliamentary investigations,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在普金過去執政期間，似乎有淪為政府合法性增強的表面化工具。

(三) 普金政權之政治系統矛盾—以2000年後政黨與國會的變革為例

在憲法的半總統制的框架下，俄羅斯高度人治的現象，如從制度性因素，也就是俄羅斯憲政體制和國會政治 (國會與政黨) 面來觀察，雖說是不夠，但是，從2000年以來，國會與政黨的活動，卻是體現其外表民主法治、內在加強集權的重大推手。國會監督活動之調控對於整體國會的權力影響最大，以下說明之。

在1990年代，國家杜馬經由立法或內部調整制定了一系列的監督機制。在2004至2005年間，卻針對這些正式規則做了一連串的修改來增加調控的程度，且試圖轉移獨立代表和委員會的權力至國家

杜馬蘇維埃（Council of State Duma, Сов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¹⁶或更高層級（如總統）。此外，增強政權合法化很明顯地是一些議事規則修訂所試圖得到的副產品。

國會監督方面增加的管理調控主要展現在四方面—政府時間（the government hour,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час”）、公聽會（hearings, “слушания”）、反貪腐委員會（the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 “комиссия по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ию коррупции”）和議會調查（parliamentary investigations,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е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

1. 政府時間

政府時間是質詢政府成員有關施行政策的每周固定機制。2004年11月10日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1101-IV次決議案「修訂第38條和第41條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規則」（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Д ФС РФ от 10.11.2004 N 1101-IV ГД «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38 и 41 регламен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中，將政府時間延長至每周兩個半小時，並將事前規劃系統化，規定會議召開前十天就要確定整個會議將討論的主題和被邀請的官員。這項改變限制了國家杜馬因應日常發燒議題的能力。

¹⁶ 國家杜馬蘇維埃（Council of State Duma, Сов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是杜馬的集體常設機關，其設置是為了國家杜馬活動議程的事前準備與審視組織問題。其組成包含國家杜馬主席和多位議員連盟（coalition of Deputies, депутатское объединение）領導人。國家杜馬副主席和各委員會主席也參與理事會的工作。

2. 公聽會

公聽會也受到較大的限制。2004年以前，只要是經由委員會同意，任何議題皆可召開公聽會，但2004年2月20日第132-IV件決議案「修訂第62、64、67和199條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規則」（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Д ФС РФ от 20.02.2004 N 132-IV ГД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статьи 62, 64, 67 и 199 Регламен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將議題限制在國家杜馬的司法權上，如此，就將召開有關國內外政策，如軍事政策的公聽會的可能性排除在外，此外，此項決議也移除了委員會召開公聽會的自主權，規定公聽會的召開必須得到國家杜馬蘇維埃（Council of State Duma, Сов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的同意。而這僅是普金加強國家杜馬蘇維埃控制、增進統一俄羅斯黨對於委員會運作的領導所實施的議事規則修訂之一，即使統一俄羅斯黨掌控了所有杜馬委員會的主席職位，也在所有委員會中佔有大部份席位。

3. 反貪腐委員會

反貪腐委員會在第三屆國家杜馬（2000-2003）時，對於貪腐的調查與報告製作非常活躍，但是，卻因當年普金撤換前鐵道部長Nikolai Aksenenko（Никола́й Е. Аксе́ненко）和原子能部長Yevgeny Adamov（Евгений Адамов）的下台事件，被視為普金派系鬥爭的工具。^⑩ 反貪腐委員會當時組成成員包含大部份國安體系的前高級官員，還以更促進杜馬調查權的先鋒之姿出現。他們所擬之有關議會調查之法律草案，還在政府與總統的反對下，於

^⑩ Nikolai Aksenenko為金融寡頭，於1997-2002年任職鐵道部長（министр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2001年因反貪腐委員會舉發，被控濫用職權和濫用鐵路事業的利潤被起訴。Yevgeny Adamov於1998年被葉爾欽指派擔任原子能部長，2001年被反貪腐委員會調查，被控詐欺與濫權，被普金撤換而下台。而此被反貪腐委員會調查而被撤換的兩個高級官員，皆是葉爾欽的派系菁英，因此，反貪腐委員會潛在性被視為普金為自身派系菁英佈置，借刀殺人之舉（Шлейнов, 2008; Remington, 2006:270）。

2003年10月一讀通過。但是，於第四屆的杜馬開始，委員會的職權被杜馬大幅縮水，其調查工作被全面停權，而被限制在法律草案的專業知識提供。

4. 議會調查

在議會調查部分，根據2001年Pelizzo和Stapenhurst訪問83位國會議員所做的國會內部意見調查中，有96%的國會議員曾經參與過議會調查（Pelizzo, R. and R. Stapenhurst, 2004:4）。從2001年開始，親總統之多數黨組成後，2001至2005年，議會調查權力大幅被行政部門指稱違反憲法人權，而無法有著穩定的法律基礎來籌組調查委員會，且如議會要重啓調查權都會被行政部門以違憲封鎖，也因此關於庫斯克號事件和莫斯科歌劇院脅持事件的調查也都在最初階段就被腰斬。2005年通過的議會調查法（law on parliamentary investigations, Закон « О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首次正式賦予國會進行調查的權利，但通過的是總統提出的版本，而非當時議會起草的版本。因此，議會調查的提出常會系統性的駁回，因為總統管理團隊會以最嚴格的法律框架來審視其調查範圍外，更規定要啓動調查必須經由一連串非常高的程序門檻，更甚的是，調查必須由兩院共同進行，其提出必須經由兩院複雜的程序投票且大多數同意，而當執法機構介入調查事件後，議會必須中止調查。故，實務上，這些規定意味著調查只有在總統的同意下才可提出。因此，非常諷刺的，議會調查是合法的，卻不可能去執行（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5; kasparov.ru, 2005）。

從上述四方面對國會監督活動來看，大幅的調控可視為俄羅斯執政菁英一直在玩「繞著規則而轉的遊戲」（game around the rules）來謀取自身利益（Yakolev, 2006:1048）。且此調控不僅僅在國會監督部分，還擴及到一般立法，如稅收立法的過度調控，目的是使所有犯錯的人都有罪，而屈服在所謂的Ledeneva（2006:85）所認為之「暫停處罰原則」（principle of suspended

punishment)¹⁸，而其目的就是在沒有克里姆林宮認可下，任何行使代表的權利的成本皆會過高或不可行。

再者，2004年國會更將其憲法上所規定的第103條國家杜馬主要職權中之「任免審計院（Accounting Chamber, Счетная палата）審計長」和「任免依據聯邦憲法法律行使職權之人權代表」之權利讓與總統指定，也就是說今後的候選人都是總統提名，杜馬通過。此種層級控制的趨勢代表著普金團隊在有著順從的多數的情況下，是有極大的機會在潛在性降低杜馬對監督事務的自治權方面進行有系統的改變。也因此，普金政權能極快在國會通過非政府組織法（the law on NGOs）和修訂集會遊行法和公民投票法（the laws on public demonstrations and referenda），作為趕在2008年總統大選前彌補克林姆林政治控制漏洞的預防措施。此外，這些正式的修訂法律與規則不僅僅是要加強總統管理的控制，更擔負著增加政權合法性的角色。可以說，延長「政府時間」主要目的不僅僅在於給予議員代表和市民有機會來看到政府官員來解釋其政策與行動，更給予政府官員一個規律性、友善的平台表現提供媒體報導。而議會調查法是準憲法的立法（para-constitutional legislation）來限制議會調查，但卻也允許讓普金和其統一俄羅斯黨議員代表對外指稱，俄羅斯將公民社會發展與議會黨派權利視為優先選項，且「提高議會的角色和加強監督功能」（Путин, 2005），而2008年的憲法修正案賦予國家杜馬有權聽取政府的年度報告，也是民主法治表面化的功夫之一。

從2000-2008年俄羅斯議會監督活動次數表（表五）可以很清楚地看見，從2002年國會親總統的多數黨確立以後，公聽會與議會質詢次數很明顯地降

¹⁸ Ledeneva提出所謂的「暫停處罰原則」（principle of suspended punishment），「此原則……顯示出在宣布的法律與現實的規範中存在著一道真實的鴻溝。在嚴法下，當人們幾乎無可避免地會犯法時，處罰變成根據法外標準因應供不應求的資源分配。每個人都可以被誣陷和處罰。但在此同時，他們發現自己會在處罰『暫停』的狀態，直至另行通知。為了使處罰暫停的狀態持續，就必須順從在非正式秩序下的潛規」。

表五 2000-2008年俄羅斯議會監督活動

單位：次數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公聽會 (hearings)	*	96	95	53	57	41	51	26	5
議會質詢 (parliamentary interpellations)	44	64	56	19	16	16	18	11	2
杜馬要求審計院查核 (Duma requests to the Accounting Chamber)	19	21	18	10	20	13	21	27	29

資料來源：Whitmore (2010:1012)。

註：* 表示2000年的資料遺失。而在第二屆杜馬期間 (1996-1999)，平均公聽會次數為89次。

低。而杜馬要求審計院查核之活動，則從2000年後次數減半 (1996-1999之每年平均次數為43、54、57和34次)，而自審計院之審計長改由總統提名後，審計院被議員代表們普遍認為是總統的代理機關。

上述的議會監督活動次數雖然大幅減少，但是，和議會調查活動相比，仍能發揮作用。即使自2005年議會調查法通過後，議會調查仍維持是罕見的，非正式的和無效率的。在2006-2008年，沒有任何正式調查的倡議，因為要求的程序繁瑣，和第四屆國會杜馬的組成因素使得正式議會調查的提出異常地困難。

再者，預算監督本也是國會制衡行政的有效利器，但是，在不管是在預算委員會和審計院，但卻也被普金政權攬為己用。一般而言，國會議員傳統上對於軍事預算均會予以尊重而不加干涉，但是，在第四屆國會杜馬期間，也非正式地放棄審核國家其他預算的能力。而這樣的作為也延續至2008年普金總統任期結束以後，2008年11月，杜馬確認預算撥款的分配權也被轉移到由七個國會上下廳院代表所組成的特別委員會 (Буркалёва, 2008)。

總而言之，國會與政黨活動的表面化工夫是俄羅斯國家政權和政府合法化的重要機制。合法化變成杜馬監督活動的主要目標與企圖之一。因此，作者認

爲，雖然2008年起普金轉任總理，但他卻仍掌握政黨與國會來增加政權合法性和個人的支持度，也掌握媒體爲其施政作宣導並展現其尊重國會之反對派之風度。因此，這也不難發現，他以非制度性因素掌控總統，而以制度性因素爲未來歸位與執政鋪路。

參、俄羅斯人的民主觀

一、俄羅斯人民主觀之民意調查

「俄羅斯選舉研究系列」(The russian election studies series, or RES) 研究團隊¹⁹ 於2008年做了有關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定義的民意調查，包含下列問題：「依你的看法，什麼是民主國家？依你的話語，民主國家和不民主國家的分野點（也就是民主構成要素）爲何？」（見表六）讓俄羅斯人民以自己的詞彙來定義民主，而不是給予封閉式問卷和條列式的答案。而關於俄羅斯人如何理解與定義民主的真實想法之結果相當地出乎意料之外，最震撼的發現之一爲超過將近四分之一的人民（26%）無法對民主做出任何定義，在此同時，有4%連試著回答都拒絕。此外，相當有意思的是，將近五分之一的人民對民主的理解和一般學者所定義的民主完全不同。也就是說，18%的俄羅斯人定義的民主包含下列組合：物質福利、市場經濟、秩序、主權、強大的領導者、經濟平等和其他。事實上，僅有41%描述的民主符合西方學者所使用的定義，包含權利、自由、法治、選舉、政治競爭或最常見的詞句：人民的權利。還有11%的人民是兩者皆有提及。

¹⁹ 「俄羅斯選舉研究系列」(The russian election studies series, or RES) 研究團隊由下列學者計畫與執行：Timothy Colton（1995至今）、William Zimmerman（1995-1996）、Michael McFaul（1999-2008）及Henry Hale（2003-2008），並與Demoscope group的俄羅斯科學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Mikhail Kosolapov和Polina Kozyreva攜手合作，RES從1995年至2008年每個選舉回合皆會對俄羅斯人民進行民意調查。

還有一個重要的發現，那就是僅有5%的樣本提及民主的核心定義——選舉或政治競爭。在「標準」的民主定義中，最常被提及的是權利與自由（37%），法治的概念和誠實的政治（13%），及相當模糊的概念，民主是人民的權利（近8%）。

再者，相當重要的是，許多俄羅斯人在解釋民主這個名詞時，是相當偏離西方學者的定義。將近十分之一的俄羅斯人認為物質福利（包含金錢收入、提供就業或高額退休金）是民主的型態定義。大約有5%的人認為民主是一個國家願意注意人民需求且允許人民「參與」的系統，是統治者的決定，而非人民的權利。其他則對民主的定義有著不同的標準，如社會平等（3%）、公平（1%）、政治秩序（2%）、強大的領導者（0.3%）、一個共同的目的或調合感（0.3%）。而僅有0.7%的人民定義民主為主權。大約有4%的人在回答民主定義問題時，是列出一大堆問題，如混亂無秩序、貧窮等，似乎將這些問題和民主劃上等號。

而以標準外的定義回答的人大概是平均分配在各階層，比較多的百分比是在50歲以上、男人且教育程度較低。

而在「尤里·列瓦達分析中心」（Levada-Center,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 Юрия Левады (Левада-Центр)）2011年1月18日公布有關「秩序或民主？」（Order or democracy?,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的民調中，超過半數的受訪者（56%）表示偏愛秩序，受訪者甚至毫不遲疑認為，要達成秩序可能「不得不做出一些違反民主原則和限制個人自由」。23%俄羅斯人認為民主較為重要，而這些回應在俄羅斯各階層人口分佈如下：認為秩序較為重要大多反應在低收入公民（71%如此回答的公民歸類自己是在於無法負擔糧食支出之列），而其他三分之一小康的俄羅斯人較為偏愛民主（31%）。而在民主的認定方面，35%的俄羅斯人認為民主就是言論、新聞和信仰的自由，而29%的人認為民主就是社會秩序和穩定的保證，27%則將民主認為是經濟繁榮國家的同義詞。36%認為秩序不能缺乏民主，但卻有13%的人認為秩序與民主是互相矛盾的。

表六 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構成要素的不同定義
 (開放性問卷，民主構成要素百分比依被訪者的所指名)

民主構成要素	%
權利與自由	37.4
法治	12.9
物質福利	9.7
人民的權力	7.7
選舉、政治競爭、投票	5.2
善意 (benevolence)	4.8
問題 (problems)	3.5
平等	2.6
秩序	1.7
市場	1.1
公平	1.0
主權	0.7
國家所有權 (state ownership)	0.5
參與	0.4
強大的領導者	0.3
調和 (accord)	0.3
其他	5.4
難以作答	26.8
拒答	4.3

資料來源：Hale (2011:1361)。

因此，綜合上述民調，也不難理解為何Hale（2011）認為俄羅斯人並非不喜歡民主體制，而是俄羅斯人的民主觀點是有異於西方學者的定義。

二、俄羅斯人民民主觀發展之影響因素

在俄羅斯憲法架構下，高度人治威權政治現象，普金還能當選第三任，俄國人民的民主觀，以西方民主價值觀之，確是出了問題。但為何有此現象，或是為何會出現一黨獨大，以致讓政治菁英有機可乘？作者認為，有下列三項因素影響俄羅斯人民的民主觀發展，分別為歷史文化的東正教文明對政治文化的影響、九〇年代俄羅斯獨立初期之政治經濟動盪及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存在的爭議性。

（一）東正教文明與俄羅斯政治文化

從公元988年到1917年，東正教一直是俄羅斯的國教，處於沙皇政權的控制之下，配合國家政策行事，為沙皇專制統治服務，「君權神授」與「政教合一」的觀念遂成為俄國政治型態的特色（Пушкарев, 1953:40）。而東正教會賦予莫斯科政權「第三羅馬」的說法，強調「神選王國」（*богоизбранный Царство*，指俄國）的尊崇地位，使得俄羅斯的民族意識中，具有強烈救世使命的世界觀，只有俄羅斯民族的發展和強盛，才能使基督教復興。俄羅斯民族的發展與東正教的復興，互為因果而使其具有強烈的大國情結，蘊含濃烈的強國意識和深厚的愛國主義精神，成為俄羅斯傳統思想的精髓所在（Пушкарев, 1953:142-43）。

再者，在沙皇時代，沙俄政教合一，為專制提供了原始的基礎。國家和宗教的緊密聯系，鞏固了民眾對權力集中的普遍認可。人民對救世主的期盼常常變成對沙皇或統治者的期盼，長達數百年實行沙皇專制統治，而1917年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政治體制轉為共產集權統治，俄羅斯的政治發展歷史造就了人民民主觀念缺失的政治文化，更賦予統治者實行鐵腕統治的政治合法性，以保障政治秩序和社會穩定。

(二) 九〇年代俄羅斯獨立初期之政治經濟動盪

在俄羅斯獨立初期，葉爾欽開始政治與經濟民主化，政治與經濟的開放，加上政府希望藉由經濟改革獲得經濟成長，因此，人民對於自由與民主是有著相當大的期待。但是，俄羅斯震撼療法的威力開始展現，經濟大幅衰退外，通貨膨脹與失業率高漲，民眾認為民主與自由經濟所帶來的並不是富有，而是痛苦時，民主體制受到質疑。因此，政策朝令夕改導致政策績效低落，更由於國會與政黨的弱勢，無法為人民申張權利，相對政策也不彰，人民根本不信任國會與政黨的機制，也間接地表現出對民主的失望。

(三) 俄羅斯的公民社會存在之爭議性

蘇聯解體至今已過二十年，公民社會在俄羅斯發展也同樣經過二十年，俄羅斯是否存在著公民社會仍具爭議性，原因有二：其一、西方學者慣以「民主」與「民主化」角度來檢視俄羅斯政權和政治，「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分指標當中，其中一個主要觀測點就是公民社會的發展，其近年來對於俄羅斯的民主自由評比分數不斷下滑，至2004年末，已經是下降至5.5分，評為「不自由」國家，而其評比從「部分自由」下滑至「不自由」，原因為「幾乎消除了在此國的具有影響力的政黨與反對力量和行政權力進一步集中。」(Freedom House, 2005)其二、中間階層(middle class)，或西方稱中產階級，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公民社會的主要力量。但是由於葉爾欽時期的承接蘇聯遺緒的統治菁英壟斷政治版圖與金融寡頭寡占經濟利益影響，及普金時期鞏固菁英群的非制度性策略如恩庇侍從、酬庸和尋租等，極其壓制俄羅斯中間階層的發展，導致社會層級結構最大的問題就是中間階層的匱乏(許菁芸、郭武平, 2013:41-2)。^⑩

^⑩ 俄羅斯可以稱為中間階層的人不足20%，一般而言，曾經或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俄羅斯與中國等，較喜歡用中間階層來代替中產階級，一是中產階級帶有資本主義色彩，二是中間階層涵蓋層次較廣，亦包含中產階級。關於「中間階層」，作為一種社會層級(social stratum)概念，一般從收入、私人財產、職業和教育、自我認定來做社會層級界

三、俄羅斯式「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

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曾一度邁向民主化，俄羅斯民眾已經親身經歷所謂的多黨制、民主制帶來的最初的快感以及接踵而來的各種負面效果，而人們把當時混亂的社會局勢和經濟狀況歸罪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易言之，俄羅斯政治轉型過程，人民民主素養並未跟上，再加上公民社會尚未成熟，因此，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的渴望度和期望值是根植於傳統宗教與政治文化的需求，仍希望國家能有一位強人出現，領導這個國家走上秩序穩定和富強之路，在俄羅斯輿論的主流觀點中，民主和強大的統治者是可以共存的。俄羅斯人民支持一個強大的統治者，但強大的統治者除了是要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選出，還要能尊重反對派的權利，而俄羅斯人民可以在他不適任時解除委任。

因此，俄羅斯人民所認為之民主體制，是比較接近歐唐奈(O'Donnell, 1994:55-69)提出了「委任式民主」(delegative democracy)的概念，所謂「委任式民主」的特徵之一，包括了只要經由選舉選出了總統，就把總統視為國家最高利益的化身和解釋者，亦如同委任了總統可以他認為合適的方式進行統治，並無須為競選時的承諾負責。歐唐奈確切的指出，由於「委任式民主」缺乏「代議式民主」所重視的監督與制衡機制，往往期待中「全能」的政府卻呈現出無能的窘境，且使行政權愈加地高度個人化與集權化而具有了反制度化的傾向。

定。Maleva (Малева) 在其2008年俄羅斯中間階層的研究中，以三個變項，也就是收入與財產、職業與教育水準、自我認同 (level of income and material well-being; occupational and educational status, and self-identification)，來定義與交叉測量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她發現如從收入 (income) 來看，有45%可定義為中間階層，從擁有耐久財 (possession of durable goods) 來看，為52%，從自我認同 (self-identification) 來看，為30%。如從教育與職業來看，僅有19%，如要求三個變項兼具，則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僅有5%，而任具有兩個變項特徵，則為15% (Малева, 2008:21-23)。Natalia Tikhonova則從三個標準—財產、自我認同、和社會專業地位和資源，包含一般和特殊的人脈 (material well-being; self-identification; and social-professional status and resources, including general and specific human capital) 來測量俄羅斯的中間階層，如果三個標準兼具，能被稱為中產階級的人不足20% (許菁芸、宋鎮照, 2012:133-34; Тихонова, 2008)。

也許是「委任式民主」的窘境已與先前所述之非制度性因素之副產品—恩庇侍從、酬庸、尋租等官場作為形成難以根斷的貪污與腐化，及統治菁英封地自限，缺乏由下至上垂直的流動的途徑，已讓俄羅斯民眾與反對團體大感不滿，而引發反普抗議。但是，也因為普金執政所展現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秩序和強烈的大國思想，滿足了俄羅斯人民的「非標準」民主的訴求，而使得俄羅斯人民在此次的總統大選中，仍有超過60%的選票投給普金，而使得普金歸位成功，但是，面對此次的大規模抗議與支持率的降低，未來普金政權如何面對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間的調整來在政權合法性與權力鞏固間拔河，將會是普金如何維持其個人領導魅力的一大考驗。

肆、普金歸位之政局影響與未來民主發展

過去二十年俄羅斯經歷了全球化和網路資訊革命的洗禮，俄羅斯的社會正在悄悄地快速變遷中。普金歸位帶來的政局影響，在於其第三次當選為俄羅斯總統後，如何超越自己前面的政績，將俄羅斯帶往人民所期望之「民主」，將是普金必須直接面對的課題。他能否實現自我超越，某種程度上也決定著俄羅斯能否進入新的發展期。

再者，2011年12月4日俄羅斯國會大選的抗議舞弊結果，民眾透過社交網站串聯抗議政府，再加上2012年3月4日總統大選結束後，3月5日也出現莫斯科爆發了反對普金的萬人集會，不禁讓人聯想起2011年年初從突尼斯賣蔬菜青年遇害後引發的「阿拉伯之春」，2012年會不會出現「莫斯科之春」呢？而此次的抗議行為是否有可能如突尼西亞、埃及延燒至政體的瓦解，個人威權的下台呢？或是更走上回頭路，以武力鎮壓示威抗議民眾呢？

雖然，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過去二十年俄羅斯也經歷了全球化和網路資訊革命的洗禮，俄羅斯的社會正在發生靜悄悄的巨大變化。現在活躍在俄羅斯各地的反普金遊行的參與者，大多數是受過較好教育、對網路與政治敏感的

年輕人，這一點同阿拉伯之春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是，如果說俄羅斯會因此爆發「莫斯科之春」，網路串聯會發揮功效，而使得俄羅斯再走回民主的道路，作者認為尚須等待時機，因為茉莉花革命重點是在政治經濟結構問題，結合資訊傳播社群造成在該國有茉莉花革命現象，而最重要的爆發點是經濟與社會危機，就俄羅斯目前的政經情勢，雖然有些緊張，但不至於會邁向阿拉伯革命之路。

茲就俄羅斯之經濟、社會情勢與未來俄羅斯的政策與民主走向做一分析。

一、經濟方面

俄羅斯的經濟目前尚稱穩定，雖然2009年後，金融危機對俄羅斯的影響開始強烈顯現出來，經濟狀況的惡化自然帶來了政治上的效應，普金作為政府總理成為批評的焦點，反普金的遊行示威也在一些城市出現，但是，令人詫異的是，普金雖然支持度略降，卻依然受到俄羅斯民眾擁戴，甚至因為金融風暴之故，梅普政府更可以國家重點紓困之因應措施來強化對地方、媒體和金融企業的控制，並以多年來油價高漲所累積之「穩定基金」來援助前蘇聯國家經濟，藉此緊密前蘇聯國家經濟空間之掌握。

而至2010年底，GDP因著國際油價高漲的因素，就已恢復為4%的成長率，外匯存底也持續增多，而就目前俄羅斯的經濟情勢看來，應該仍有餘裕去應付人民的不滿情緒，但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經濟的未來發展，世界銀行報告指出，資源型經濟高度依賴國際油價和資源原物料出口是近年來俄羅斯經濟成長的關鍵，也是俄羅斯經濟危機型態（World Bank, 2011:26），因為資源型經濟潛在性風險就是對外在的衝擊抗壓性極低（尤其是國際油價的不穩定性）、荷蘭病風險和特有制度上的弱點。在未來如要維持一定的經濟成長，長期的經濟發展計畫則必須解決最根本的產業結構、政府制度和出口市場問題，也就是調整經濟結構促使經濟多元化、減少政府干預和擴大出口市場（Ahrend, 2006:20-28）。此三者息息相關，且對俄羅斯政府長期而言，都是極大的挑戰。

二、社會方面

無論是顏色革命或阿拉伯之春，可以發現，國內的權力菁英早已分裂，且在社會上有著強大的力量與名望的反對派菁英已對政局虎視眈眈，執政當局早已意識到面臨一個社會強大反對力量的挑戰。

但俄羅斯對於一黨獨大、沒有一個強大的多極政治結構的擔憂，也就是缺乏一個能與國家權力黨對抗的團結反對力量，是視為半開放性社會民主無法鞏固的原因。俄羅斯的統治菁英內部雖有傾軋，但對外卻一致團結鞏固權力。

再者，普金政府不會像利比亞，埃及等國家那樣大規模鎮壓示威遊行。雖然選舉後大量的士兵調入莫斯科市中心，但是政府強調這是定期輪換。雖然政府逮捕了一部分示威者，但是只對組織者進行了15天的拘留，且普金也保證只要在法律範圍內遊行示威是可以允許的。此外，可以發現，俄羅斯的示威遊行，無論是莫斯科或聖彼得堡、或於其他城市或地方，都是獨立運作，缺乏強勢的領導者或有人望的政黨，俄羅斯政府對於示威抗議也發展出策略因應，這些策略包含集會遊行的申請許可、政府贊助主導青年支持政府社會運動和以叛國者或反對愛國者名義加諸在激進的示威抗議領導人身上等等（Robertson, 2009:528-47）。

三、俄羅斯未來民主走向

2012年「普金歸位」是否延續其前兩任的執政與強者領導型態，擺盪在法理（legal-rational）與世襲制（patrimonial）的氛圍（sphere）裡，作者認為，從此次普金在競選期間放軟態度，幾度與民眾近距離接觸且滿懷笑容，至宣布當選時刻潸然淚下的態度分析，普金其實也意識到民眾累積的不滿情緒，除了承諾將會繼續為人民的福利與國家的穩定做努力，也將對政府內部做大規模的調整。對於民眾抗議政權合法性的威脅，對於政權合法性來源，普金和其統治菁英一則以政策績效成為其主要來源因素和可控制變項，二則暫時會開放民主治理、成員自主性的空間來因應人民和地方的不滿，這是普金政權的一貫作

風，因此，作者認為，其內在仍舊是新瓶裝舊酒。

我們可以從普金2012年宣誓就職前後之主要四個重大改革分析之，此四大改革為2012年1月16日俄羅斯總統梅德維傑夫向國家杜馬提交「關於修改俄羅斯聯邦各聯邦主體政府立法機關及行政機關組織法」法案（«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ных) и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убъект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規定地方行政首長將進行直接選舉產生、2012年4月4日聯邦法28-FZ修正條文「關於修改俄羅斯《政黨法》」（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02.04.2012 года №28-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артиях»。）放寬政黨標準，從原先的4萬人的門檻降低到500人；2012年7月30日修訂聯邦法139-FZ條文「關於修改保護兒童免受損害健康和發展的資訊的聯邦法律及個別法令」（federal law of Russian federation no. 139-FZ “on amendments to federal law on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information harmful to their health and development and certain legislative act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139-ФЗ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 защите детей от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чиняющей вред их здоровью и развитию“ и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опросу ограничения доступа к противоправ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сети Интернет»）允許政府設置一個黑名單阻止公眾對禁止傳播之資訊的接觸，及2013年4月16日俄羅斯國家杜馬一讀通過俄總統普金今年3月1日提交的有關恢復國家杜馬選舉混合制的法案「關於俄羅斯聯邦議會國家杜馬代表選舉法」（«О выборах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並降低了比例代表制得票率的門檻（從7%變為5%）。

從2012年的新政黨法的實施看，俄羅斯雖然開放政黨登記門檻，新登記政

黨的組織成分混雜，政治傾向各異，既有現政權的堅決支持者，也有持反對派立場的左翼或右翼政黨，還有中間派政黨。即使在同一政治流派內部，也存在相互競爭的幾個政黨，小黨林立。對於新登記的政黨來說，只要目前不允許在杜馬選舉中結成競選聯盟的法律仍然存在，大多數新黨就很難在下一屆杜馬選舉中達到5%的得票率門檻而進入議會。

再者，從國會杜馬選舉法恢復混合制與地區行政首長選舉看，雖然選舉法中降低了比例代表制得票率的門檻，但是，單一選區代表制有利於大黨，即使是開放了政黨登記，改採混合制，仍是要保障統一俄羅斯黨一黨獨大的地位，避免再出現2011年國會選舉統一俄羅斯黨席次不過半的窘境。而地方行政首長選舉從直選又再變為允許各聯邦主體取消直選行長首長之舉，更顯示出普金為鞏固自身權力與架空法律與制度的內涵的作法。

此外，2012年6月與7月對於規範公民團體的立法，對於反對勢力規範與外國力量的介入，防止顏色革命中外國力量的財務與精神支持，可以看見仍是重重把關，更增加媒體與網路的調控與行政罰鍰，國家社會間關係的重整，對於普金與俄羅斯統治菁英而言，既能管理公民社會，也能使政權合法性提升。但是，對於過濾網站立法引致不少批評，認為是因爲目前俄羅斯網路所聚集的抗議者年齡層下降，政府是以保護兒童之名，實則增加網路監控和遏制言論自由，允許俄羅斯政府建立一個黑名單以過濾某些網站的訪問，就像中國的防火長城（RIA Novosti, 2012）。

總而言之，在經濟變項與政策績效變項皆有所不足時，普金政權會暫時開放民主治理之變項來維持其政權合法性。2012年總統大選後的恢復地方行政首長直選和放寬政黨登記門檻等政策也是維持其政權合法性之「輸入」變數，以民主治理來緩和民怨。

伍、結論

普金在2000至2008年擔任總統期間，深受蘇聯式教育的他，其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Strong State)，也就是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試圖恢復有效的垂直權力鏈(restore an effective vertical chain of authority)體系，其實施的中央再集權(recentralization)政策，使得俄羅斯的民主化走向隨著普金的個人威權的鞏固招致了許多批評。

普金的中央再極權強國策略卻使得他及其政治菁英以法律與制度來增加政府的合法性與支持度的同時，他鞏固菁英群的非制度性策略卻以非正式運作，如恩庇侍從、酬庸和尋租等來鞏固自身權力與架空法律與制度的內涵，無論是政治面或是經濟面，引起貪腐不斷，卻根絕不了。尤其是普金於2008年卸任總統、轉任總理期間，在俄羅斯強勢總統憲法體制下，普金要壓制前總統梅德維捷夫的總統氣燄並把持住相當權力，還要為自己未來歸位努力，防止強大的反對勢力或人物崛起，非正式運作的檯面下作為更爲猖獗，而對於媒體與反對團體與運動的管控更爲嚴密，甚至公開操弄2011年的國會選舉，而引發大規模抗議國會大選舞弊及反對普金的遊行示威。

此示威抗議也代表著，俄羅斯人並非不喜歡民主體制，而是俄羅斯人的民主觀點是有異於西方學者的定義，俄羅斯人民對於民主的渴望度和期望值是根植於本土的需求，仍希望國家能有一位強人出現，領導這個國家走上秩序穩定和富強之路，但是強大的統治者除了是要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選出，還要能尊重反對派的權利，而且俄羅斯人民可以在他不適任時解除委任。

雖然，2011年的國會大選和2012年的總統選舉引發大規模的反普抗議。但是，普金執政所展現之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秩序和強烈的大國思想，仍透由媒體的控制與宣傳，滿足了俄羅斯人民的「非標準」民主的訴求，使得普金歸位成功。

總而言之，歸納普金歸位成功的要素中，作者認爲，生活是否改善是影響

俄羅斯選民投票行為最主要因素。俄羅斯人民長年住在冰天雪地氣候環境下，養成高度的忍難特性，從歷史上看幾乎都是因為生活過不下去才被迫走上街頭。由俄羅斯當代社會經濟發展方面來看，當前俄羅斯的社會經濟遠比蘇聯末期，以及2000年以前前總統葉爾欽時期都好上許多。因此迄至目前走上街頭的群眾尚屬少數，況且未來仍然看漲的油價，將仍會是普金執政的有效利器。但是，如何超越自己前面的政績，將俄羅斯帶往人民所期望之「民主」與強大國家願景，以及面對此次的大規模抗議與支持率的降低，未來普金政權如何以制度性與非制度性因素間的調整來在政權合法性與權力鞏固間拔河，將會是普金如何維持其個人領導魅力的一大考驗。

參考書目

- 吳玉山（2002）。〈半總統制下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羅斯、波蘭與中華民國〉，《俄羅斯學報》，第2期，頁229-65。
- (Yu-shan Wu [2002]. "Cabinet Formation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under Semi-presidentialism: Comparing Russia, Poland and the ROC." *Journal of Russian Studies*, No. 2:229-65.)
- _____（2007）。〈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臺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頁67-112。
- (_____ [2007]. "The Promises and Limitations of Color Revolution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4, No.2:67-112.)
- _____（2009）。〈解釋俄羅斯的民主倒退〉，《臺灣民主季刊》，第6卷，第1期，頁199-205。
- (_____ [2009]. "Explaining Russia's Derailed Democracy." *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 Vol. 6, No. 1:199-205.)
- 吳春光（2008）。〈普京的能源政策分析〉，《政治科學論叢》，第35期，頁1-46。
- (Chun-kuang Wu [2008]. "Analysis of Putin's Energy Policy in Russia"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35:1-46.)
- 許菁芸（2010）。〈俄羅斯國會之發展剖析〉，《政治科學論叢》，第43期，頁119-58。
- (Jing-yun Hsu [2010].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ssian Parliament."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43:119-58.)
- _____（2012）。〈俄羅斯亞太出路—俄羅斯遠東地區困境與俄中關係問題探討〉，林碧焰、鄧中堅（主編），《金磚國家俄羅斯及歐亞地區研究》，頁79-132。台北：五南。
- (_____ [2012]. "Going to Asia-Pacific: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on Russian Far East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Bi-zhao Lin, Chung-chian Teng [eds.], *BRIC countries: Russia and the Eurasian region* [pp. 79-132]. Taipei: Wunan.)
- 許菁芸、宋鎮照（2012）。〈俄羅斯的民主抉擇與統治菁英權力結構變化〉，《東吳政治學報》，第29卷，第4期，頁117-75。
- (Jing-yun Hsu, Jenn-jaw Soong [2012]. "Russia's Democratic Choice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Power Elite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9, No. 4:117-75.)
- 許菁芸、郭武平（2013）。〈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混和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政治科學論叢》，第55期，頁33-84。
- (Jing-yun Hsu, Wu-ping Kwo [2013]. "Russian Civil Society 'Management'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under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 55:33-84.)
- 康世昊（2009）。〈全球經濟危機與普丁主義的挑戰—以皮卡洛瓦（г. Пикалево）地方抗爭事件為例〉，「後共二十年—延續與轉變」學術研討會論文。台北：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11月14日。

- (Shih-hao Kang [2009].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the Challenge to Putinism: An Example of Local Protests in Pikaliovo." Paper presented in Symposium on Postcommunism two decades: Continuity and Change. Taipei: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GIR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CCU), November 14.)
- Ahrend, Rudiger (2006). "How to Sustain Growth in a Resource Based Economy? The main Concep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the Russian Case." *OECD Economics Department Working Papers*, No. 478. <http://www.oecd.org> (accessed June 26, 2009).
- Beichman, Arnold (2007). "The Perils of Putinism." *Hoover Digest 2*.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hoover-digest/article/5890> (accessed February 25, 2012).
- Brzezinski, Zbigniew (2008). "Putin's Choic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1, No. 2:95-116.
- Elgie, Robert (2007). "Varietie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their impact on nascent democracies."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3, No. 2:53-71.
- Duverger, Maurice (1980). "A New Political System Model: Semi-Presidential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8, No. 2:165-87.
- Fish, M. Steven (2005). *Democracy Derailed in Russia: the Failure of Open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reedom House (2005). "Freedom in the World 2005: Russia."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port/freedom-world/2005/russia> (accessed June 16, 2012).
- Hale, Henry E (2011). "The Myth of Mass Russian Support for Autocracy: The Public Opinion Foundations of a Hybrid Regim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3, No. 8:1357-75.
- Inozemtsev, Vladislav (2009). "The nature and prospects of the Putin Regime."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Vol. 50, No. 1:40-60.
- Ledeneva, Alena V (2006). *How Russia Really Works: The Informal Practices That Shaped Post-Soviet Politics and Business*. Ithaca, NY &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Linz, Juan (1994). "Presidential or Parliamentary Democracy: Does it Make a Difference?" In Linz, J.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3-87
- Lynch, Allen (2005). *How Russia Is Not Ruled: Reflections on Russi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Faul, Michael (2005). "Transitions from Postcommu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6, No. 3:5-19.
- O'Donnell, Guillermo (1994). "Delegative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5, No. 1:55-69.
- Packham, Robert (1970). "Legislatur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Norton. P (eds.), *Legislature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1-96.
- Pelizzo, Riccardo and Rick Stapenhurst (2004). *Legislatures and Oversight*, World Bank Institute Working Papers. Washington, DC: IBRD/World Bank.

- Remington, Thomas (2006). "Patronage and the Party of Power: President-Parliament Relations Under Vladimir Putin." In Colton, T. & S. Holmes (eds.), *The State After Communism: Governance in the New Russia*. Lanham (p.p. 261-98),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261-98.
- RIA Novosti (2012). "Russian Lawmakers Set to Debate Internet Blacklist: Russian Duma Approves Internet Blacklist." http://en.ria.ru/trend/Russian_Duma_Approves_Internet_Blacklist_2012/ (accessed July 06, 2012).
- Robertson, Graeme B. (2009). "Managing Society: Protest, Civil Society, and Regime in Putin's Russia." *Slavic Review*, Vol. 68, No. 3:528-47.
- Ross, Cameron (2005). "Federalism and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under Putin." *Demokratizatsiya*, Vol. 13, No. 3:347-71.
- Sakwa, Richard (2008). "Putin's Leadership: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0, No. 6:879-97.
- Sevastyanov, Sergey (2008). "The More Assertive and Pragmatic New Energy Policy in Putin's Russia: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Northeast Asia." *East Asia*, No. 25:35-55.
- Shelton, Judy (2008). "The Market Will Punish Putinis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3, A, 23. <http://texnews.livejournal.com/17289.html?thread=36233> (accessed March 3, 2011).
- Shugart, Matthew Soberg. and John M. Carey (1992). *Presidents and Assemblies: 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oxel, Tiffany A. (2003). *Parliamentary Power in Russia, 1994-2001. President v.s. parliament*. New York: Palgrave.
- Will, George F. (2004). "Putinism On the March".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30. In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20887-2004Nov29.html> (accessed March 03, 2011).
- Whitmore, Sarah (2010).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in Putin's Neopatrimonial State. Watchdogs or Showdogs?" *Europe-Asia Studies*, Vol. 62, No. 6:999-1025.
- World Bank (2011). "Russian Economic Report No. 26."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RUSSIANFEDERATION/Resources/305499-1245838520910/6238985-1316082024531/RER26_ENG.pdf.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11).
- Yakolev, Andrei (2006). "The Evolution of Business-State Interaction in Russia: From State Capture to Business Capture?"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8, No. 7:1033-66.
- Буркалёва, Ольга (2008). "Единороссы лишают Думу властных полномочий." *Правда*. November 6. <http://kprf.ru/dep/60970.html> (accessed April 23, 2011).
- Газета "Коммерсантъ" (2005). "Дума отказалась от закона о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75 (3259). September 17. <http://kommersant.ru/doc/609787> (accessed April 10, 2011).
- 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2008).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в 2007 году.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М.: Панорама.

- Известия (2006). “В среду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лита согласилась говорить на одном языке”. August 31. <http://www.ksrf.ru/Press-srv/Smi/Pages/ViewItem.aspx?ParamId=1237> (accessed April 10, 2011).
- kasparov.ru. (2005). “Последнее чтение: Госдума приняла закон о парламентских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December 7. <http://www.kasparov.ru/material.php?id=4396F0FE7F5AD> (accessed April 10, 2011).
- Коргунюк, Юрий (2001). “Партий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в России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тий.” *Выборы.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и технологии*, № 1. http://www.partinform.ru/articles/part_str.htm (accessed April 29, 2008).
- Левада-Центр (2007).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ситуация в марте и апреле 2007 года, Доверие институтам власти: В КАКОЙ МЕРЕ, НА ВАШ ВЗГЛЯД,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ДОВЕРИЕ ТАКИЕ ИНСТИТУТЫ КАК...?” <http://www.levada.ru/press/2007050302.html> (accessed May 3, 2007).
- _____ (2011). “Порядок или демократия?” <http://www.levada.ru/press/2011011802.html> (accessed January 18, 2011).
- Малева, Татьяна М (2008). “Российский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вчера, сегодня, завтра.” *Proceeding of a Conference on Средний класс: Проблемы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оста*. 24 April 2008. Москва: Институт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и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2008).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 <http://www.minprom.gov.ru/dep/energy/5/14/> (accessed January 20, 2011).
- Путин, Владимир (2005).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April 25.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5/04/25/1223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87049.shtml (accessed April 29, 2011).
- _____ (2007). “Послание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Москва: Кремль, April 26. 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7/04/26/1156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125339.shtml (accessed January 20, 2012).
- Пушкарева, Сергей Г. (1953). *Обзор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Нью-Йорк: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мени Чехова.
- Сурков, Владислав Ю (2006). “Наш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модель демократии называется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ей» ” *брифинг*. July 28. <http://www.edinros.ru/news.html?id=114108> (accessed April 30, 2011).
- Тихонова, Наталья Е (2008). “Классы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иф или реальность?” In М.К.Горшков (eds). *Россия еформирующаяся: Ежегодник. Выпуск 7*. М.: 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 РАН. 62-92.
- Шлейнов, Роман (2008). “Адамов и грехи.” *Новая газета* 13. February 21. <http://www.novayagazeta.ru/inquests/41407.html> (accessed April 10, 2011).

ЦИК России (2011). “Результаты выборов: Выборы депутат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шестого созыва.”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28713304&vrn=100100028713299®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null&vibid=100100028713304&type=242 (accessed December 20, 2012).

_____ (2012). “Выбор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www.vybory.izbirkom.ru/region/region/izbirkom?action=show&root=1&tvd=100100031793509&vrn=100100031793505®ion=0&global=1&sub_region=0&prver=0&pronetvd=null&vibid=100100031793509&type=227 (accessed March 9, 2012).

Analysis of Putin's Return to Presidency and Democratic Development under the Semi-Presidential System in Russian Federation

Jing-yun Hsu

Abstract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Semi-presidentialism, the phenomenon of Putin Regime of long standing makes Western scholars believe that Russia is back to authoritarianism and has serious impact on Russia's democratic processes. Russia held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n December 4, 2011, and announced the election results next day. Although the ruling United Russia party was leading with 49.5 per cent of the vote, it was a sharp drop which compared with the previous vote that landed the party a two-thirds majority in the state Duma. Anyway, when analyzing the results of State Duma elections, we may find that Russians are really discontent with Putin Regime, but not the regime's legitimacy questioned. Therefore, in 2012 Putin return to the presidency successfully.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structural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non-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Putin's return to presidency and the impact on Russia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centralization in Russia is still under the name of democracy (sovereign democracy). That is, us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ategy as the package of non-institutional policy enforcement. The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cluding the control of State Duma and political parties, the legislation to regulate civil society and oppositions, and the special views and expectations of the Russians for democracy, made the success of Putin's return to presidency. But, how Putin can lead Russia to the ways of Russian people's expectations of "democracy" and "strong state" beyond his previous achievements, will be the main issue, Putin must face directly during his tenure under the pressure of the protests against corruption and the reduction of his support rate in the next six years.

Keywords: Russia, Putin, presidential election 2012, state Duma, legitimacy.

Jing-yun Hsu is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nhua University. She is also a part-time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Her research areas include Russi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research, comparative studies o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